

在融合发展中迈向乡村文化振兴

吴理财

〔摘要〕 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受多元因素综合影响呈现多元复调特质，始终处于融合变动的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振兴并非复兴传统农耕文化，而是立足多元文化基底推动其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这亦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命题。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以工业化为核心基调，表现为工农、城乡发展失衡的状态，乡村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乡村文化也陷入主体性消解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西方单一发展模式，强调城乡融合、工农互促，将乡村现代化纳入国家现代化核心体系，明确乡村是不可替代的生活形态与文明载体。乡村振兴是对既往发展模式的纠偏。乡村文化的发展本质是与多元文化交融的过程，唯有确立文化主体性，方能实现主动的择优融合。融合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须以“两个结合”为指引，推动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秉持以我为主原则吸纳先进文化因子，坚守乡村“农”字底色，依托创新驱动深化农文旅融合、强化数智赋能，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让乡村文化成为赋能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在融合与创新的统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融合发展；创新驱动

〔作者〕 吴理财，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601
DOI:10.16870/j.cnki.51-1763.2026.01.010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叠加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化。如今的乡村文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综合影响。当下的乡村文化已非昔日单纯的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而是呈现出多元复调的特征。这种多元复调的特征恰恰说明乡村文化始终处在一种融合变动的过程之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所谓的本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这种东西，只不过之前的乡村文化往往处在被融合的地位而不能发挥其主体性作用而已。因此，当下乡村文化振兴，并非旨在简单地复兴传统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而是要在多元复调的乡村文化基础上，推动其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从而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乡村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命题

从城乡发展的历史比较来看，我国前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一个“跛足”的现代化，乡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发展。近代以降，我国踏上现代化道路以后，乡村非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反而不断走向衰败和凋敝。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面对这一课题，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掀起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绝大多数人将中国的乡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要么主张农业化，要么主张工业化，要么主张工农并举。无论是主张农业化（乃至农业立国）还是主张工业化（或者工业立国），绝大部分人把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相等同；尤其是前者，更简单地认为发展农业（或者农业立国）便能复兴乡村（乃至拯救中国）。在这场论战之中，只有杨开道、梁漱溟等极少数学者把乡村视为一个社会或文化的概念加以认识，并从乡村的社会和文化方面探寻乡村凋敝的原因，思考乡村建设乃至整个中国建设的路径。

杨开道指出：“农村问题决不是农业问题。”^① “农村问题”实则是整个乡村社会的问题。对于梁漱溟而言，乡村问题之根本乃是乡村社会构造的重建问题。他认为：“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② 梁漱溟进而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③ 他将当时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归咎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固有）文化的变化、乡村文化的失调。因此，即便“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④ 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意在解决“文化失调”问题，不过他所说的文化并非现代性文化，而是中国“固有”文化，也就是他念兹在兹的儒家文化。简言之，梁漱溟推行乡村建设，意在恢复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尤其是他所属意的“伦理本位”的“理性”社会秩序。对此，千家驹对梁漱溟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说：“旧‘治道’之崩溃，我们是不必留恋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造成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培养新的法制礼俗，而不是发明一套做好了的‘礼俗习向（社会秩序）’，而后改造我们的经济组织与

^①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5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政治组织。”^① 梁漱溟虽从文化上对近代中国乡村衰败进行了诊断，他所开出的却是一剂复古的老旧药方——正如时人所评价的，其乡村建设是保守主义的复旧运动。^②

1949年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了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初期乃至中期阶段，我国不得不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致使工农、城乡间的发展鸿沟日益加深，乡村逐渐沦为工业和城市的附庸。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又主要在乡村之外持续推进，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如今，回望我国前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工业化乃至城市化几乎都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之下展开，总体上都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作为外在于乡村的一个发展过程来推动的。也就是说，我国乡村长期被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在城市发展工业，普通的农民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就像戴维斯（Deborah Davis）所说的那样，“当中央政府的计划占支配地位后，……城市企业从乡村分离出来，城市史无前例地用‘牢固的边界’把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分割开来，这种边界就如同深沟围绕的城墙一样”^③。并且，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只能用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来实现，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在1950—1980年间，农业部门总共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约10243.74亿元的积累，农业资源输出总额达到14508.77亿元。^④ 它不仅导致农民负担增加乃至过重，而且导致农业增长缓慢乃至负增长，以致乡村发展落后、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这就衍生出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的历史命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乡村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与城市的差距拉大了。

工业化促进城市的生成，城市进一步强化了工业主义。由此，乡村与城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工业时代的城市并不是中心性地主宰着乡村，相反，它们被广阔无际的乡村生活所包围，并寄生在乡村的农业劳动之上。城市的消失，对于农村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工业主义催生出来的现代大都市，却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它们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并且依附于都市自身。都市不仅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而且还一步步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反过来成为

^①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7期（1935年4月6日）。

^② 李紫翔：《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益世报·农村周刊》第72期（1935年7月20日）。

^③ Deborah Davis, “Introduction: Urban China. in Deborah Davis,” in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

^④ 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

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① 易而言之，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从“寄生”到“中心”、乡村从“主宰”到“依附”的“转身”。^②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眼观乡”乃至这单一的现代化的眼睛看来，乡村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包括乡村文化在内的一切都被认定为“前现代的”，甚至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在这种线性的进化论式的现代化话语中，一切“前现代的”都是落后的，都要摒弃。前一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不发展或欠发展的事实，似乎又进一步论证了乡村文化的落后，甚至不少人将乡村的不发展或欠发展归咎于乡村文化的落后。于是，“改造”乡村和建设乡村文化成为我国现代化前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主题和国家工程。

很显然，“乡村成为问题”是这一现代化镜像中的发展落后问题。在与城市发展的对比中，乡村的发展落后问题愈发突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短暂的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乡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次落后于城市发展，并且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的人口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资源被无形的抽水机虹吸到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落差。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年轻一代农民也对生养他们的那个乡村产生了厌弃，对乡村文化怀有深深的自卑情结。许多人将一切与乡村相关的事物视为时代进步的累赘，弃之如敝屣。乡村，在这一现代化的熔炉中逐渐褪去了其原有的“根本”色彩，被贴上了“落后”“土气”“保守”等负面标签。^③ 于是，建设乡村（文化）、发展乡村，一时成为主流政策话语。

总而言之，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我国前一百年来的现代化基调是工业化，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乡村不仅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固化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从历史角度来看，“三农”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国现代化前期探索的必然产物。^④

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认识到单一工业化的局限性，提出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着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⑤四个现代化推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

^①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编者前言，第10页。

^②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③ 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④ 王先明：《走进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搞现代化建设”上来，深刻认识到中国搞现代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②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③的战略，以及“统筹城乡发展”^④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⑥，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的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把乡村振兴放置于中国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进程中来考察时不难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其推行，实则是对前一个时期将现代化简单化为工业化、片面强调城市化战略的适度纠偏和政策调适。城乡互融、农工互促理应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主基调。所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从属于城市、乡村消弭于城市的境况，使乡村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重大战略。^⑦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若是以牺牲乡村的利益为代价，便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是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人民都要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是城乡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

诚如王先明所言：“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居于什么位置，是任其自然萎缩、衰败、淘汰，还是促进其发展、进步和转变；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还是将其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③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51页。

④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63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4页。

⑦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化进程中都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前者的后果将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发展动力，后者的结果恰恰相反。”^① 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将农业、农村和农民纳入其中，积极推进乡村现代化。乡村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城市化乃至信息化同步、协同和交融发展。

然而，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没有及时跟上来，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当前我国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的正确判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积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能否顺利达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或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际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民现代化。换言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求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即乡村现代化。相应地，乡村文化必须同步得到繁荣和发展。不仅乡村现代化必须且只能以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来定义，而且乡村现代化最终要以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来衡量。

中国式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它常常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实现路径），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精髓，更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孕育出现代农业文明的新形态。更准确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农业文明相互交融、共同进步的文明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的农业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反地，表征现代工业文明的工业化或城市化，往往会无止境地向土地和自然索取乃至最终破坏自然，招致自然灾害的报复，损害人类永续发展。在对待自然问题上，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②

在这样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观照之下，我们才会认识到，乡村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被城市所取代，亦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和城市都是人类值得珍视的重要生活方式，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价

^① 王先明：《走进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374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33页。

值。城市有城市的特点和优势，乡村有乡村的特点和优势，两者应该并存、共生共荣，而不是扩张城市、简单地减少乃至消灭乡村。

乡村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被人所怀念或向往，不仅仅由于它是一种“慢生活”、“宁静生活”或“生态生活”，而且是因为它蕴含的价值，即团结、互惠、合作、信任、亲情、守望相助等。或许这些，才是我们“乡愁”之所系，而不仅是乡村景致、田园风光，也不仅是“慢生活”——实则是城市人的想法和需求，符合城市人的口味。一些人造的文旅小镇、新农村并不能让人产生乡愁，是因为它缺乏原来乡村生活方式中蕴含的团结、互惠、合作、信任、亲情、守望相助等价值。正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步伐增加了人的向往，向往昔日较慢的节奏，向往延续性，向往社会的凝聚和传统”^①，而这些向往之物恰恰是乡村生活方式所独有的。

既然乡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可欲的生活方式，可否衍生出以它为基础的现代化？或许罗志田是对的，他说乡村生活方式不啻为一种富有弹性的和可能性的典范，它能够包容各种生活方式和产业形态，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相比于城市化，以乡村为基础的现代化或许更具开放性。它既能回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又能保持乡村本色，不必让农民付出太多的代价，因为它更倾向于“温故知新”，而不仅仅是“推陈出新”。^②农业无论是作为一种劳作形式，或者是在工业城市之外的乡村生活方式，需要我们以新的思路加以思考。^③很显然，“乡村文化是可以参与‘完美生活’的构建的，或者说，缺失了乡村生活的文化诗意，我们就失去了理想的生活状态”^④。

简言之，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乡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⑤

乡村不是凋敝落后的代名词，完全可以与城市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承载地。我国14亿多人口，9亿多在城镇，近5亿在乡村。未来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也向往在居住地就能过上现代化生活。要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

^①斯特维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②梁心：《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序言第18页。

^③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3页。

^④李静、季中扬等：《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⑤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74页。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乡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幸福家园。^①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②。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应是乡村服从城市、乡村服务于城市的发展，更不应是使乡村完全转变为城市的复制品，而是实现乡村自主的、全面的现代化。^③

习近平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④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因密码，也是新时代提振乡村精气神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逐渐衰落凋零，一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正在加速消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进一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积极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⑤

二、融合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中之重。如今，尽管人们越来越注重乡村文化振兴，但是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却存在诸多误读。在一些人看来，乡村文化是指一成不变的淳朴的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乡村文化振兴就是恢复和复兴这种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

其实，乡村文化始终会随着乡村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即便在超稳定的传统时期，我国乡村文化也会随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而发生变革，尽管这种变革会非常缓慢。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乡村文化特色，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乡村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包括文化在内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⑥。“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

①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

②刘国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

③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④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0页。

⑤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① 诚如毛泽东所言：“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② 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文化变迁，其根源就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农耕方式逐渐衰落，乡村社会原有结构瓦解，乡村传统价值观念解纽，共同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深刻变迁。

乡村文化不仅随着乡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其变化在本质上是一个与其他文化交融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的内容并不相同。迄今为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乡村文化的交融发展大体上都是在受到乡村之外强势文化影响之下被动发生的。在早期的现代化中，我国乡村文化主要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工业文化）和新兴都市文化的影响，原来城乡之间的文化连续体逐渐被破坏，城乡之间的文化裂隙越来越大。在从传统帝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城乡分化在文化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在政治经济上的差异性表现更大。^③ 而且，城市文化相对于乡村文化愈来愈处于主导的地位，城乡分化及其文化裂隙被视为区分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的一条最重要的分割线。^④ 城市是现代的，乡村是传统的；城市文化是先进的，乡村文化是落后的。这便成为盛行于世的主流观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乡村文化自然难逃“斯文扫地”的厄运，跌到了文明发展的谷底。^⑤ 尽管在近代化的滚滚洪流中也会偶尔瞥一眼乡村，却终因乏力而无法扭转乡村败落的颓势。^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乡村文化主要受到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乡村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村日益开放以及城乡之间各种资源和信息密集交流，各种异质性文化要素纷至沓来，我国乡村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互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的复杂图景，开启了新时代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与重构进程。^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③ Joseph W. Esherick,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David Faure & Tao Tao Liu(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Andrew Kipnis, “Within and Against Peasantness: Backwardness and Filiality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5, 37(1):110—135.

④ 朴忠焕：《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李胜波等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 王钧林：《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

⑥ 范玉刚：《在中华文明与全球化双重视域中领悟乡村文化复兴的意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⑦ 彭秋归：《乡村文化的自主性选择与在地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20日。

乡村文化之所以在交融发展中处于被动的位置，主要是因为自我国踏上现代化之路以来它逐渐丧失其主体性。在现代化初期，中国和西方接触后，西方科学、技术和商品冲进了中国大门，随之流入的还有民主、人权、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和思潮。这些思想都对中国的自我界定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社会精英，对中国固有文化（其底色是中国农耕文化）失去了自信，产生了自卑心理。^①几乎同时，“1900年清政府发起的现代变革，它使城市逐渐从周边的农村中脱离出来，也促进了独特的城市文化的产生”^②，而且，“当城市逐渐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时，农村地区会觉得它们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比起中国各地区或各省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③。受这两大变革的双重影响，“对中国乡村文化的质疑、批判、否定之声是主调”^④，乡村文化在之后的岁月中逐渐被矮化和污名化，进而丧失其主体性。

在之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非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愈发被消解。“当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时，必然导致乡村有生力量的流失，进而造成乡村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逐渐空心化，缺乏经济支撑和传承主体的乡村文化就可能走向衰落。”^⑤乡村文化在与其他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失去了主体性，必然处在消极被动的地位，被其他强势文化所融合。也正因为如此，乡村文化在与其他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泥沙俱下，导致融合的内容良莠不齐。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⑥唯有那些具备鲜明主体性的文化，方能对其他文化进行明智而有选择性地吸纳与融合，才能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美美与共。

也就是说，“只有当乡民有了文化主体性，才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乡土。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形态，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都要将当地乡民的文化需求放在首位。在多元文化的引入、比较、选择和创新过程中，充分尊重乡民的主体地

^①朴忠焕、李胜波等：《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Henreitta Harrison, “Village Identity in Rural North China:a Sense of Place in the Diary of Liu Dapeng,” in David Faure&.Tao Tao Liu(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t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03—104.

^③Tao Tao Liu, “Local identity i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ative soil (xiangtu wenxue),” in Tao Tao Liu&.David Faure(eds.), *Unity and Diversity: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3.

^④赵秀玲：《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演进与创新路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⑤彭秋归：《乡村文化的自主性选择与在地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20日。

^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位，发挥好文化乡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开创乡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新局面”^①，而不是把乡村人民排除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主体之外。近些年，一些地方在开发乡村文化产品、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并不是从乡村民众的角度来考虑，更不是从乡村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出发，以致“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文化浅表性的仪式开发风靡一时，古老的祭祀成为旅游项目，宗教演绎成为廉价的狂欢。仪式转变为展演，保留的只是仪式感，文化事象与产生文化事象的土壤被割裂，文化事象背后强大的意义世界被虚化”，说到底，“这种文化事象复活的意义在于取悦文化旁观者而非文化持有者，因此，取悦他者以创造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的乡村文化产业不可避免地带有媚俗的特征”，这种乡村文化开发必将造成乡村文化与自身的疏离，不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文化振兴。^②

近代以降，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也在与其他文化的被动融合之中不断演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农民经济理性、公平观念、契约精神、法治理念和权利意识日渐生成，并与其传统伦理观念形成共生与紧张并存的关系。^③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这一叠加的现代化日益深入发展。今日之乡村文化，早已不是过去那个纯粹的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了，而是多元复调的乡村文化。在叠加的、梯度推进的现代化中，只能在融合发展中迈向乡村文化振兴。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更应坚持中华文化主位视角，积极推进乡村文化的融合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带来了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碾压，但同时也带来了各民族国家对自身文化的重视，从而使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获得生机。在全球化背景下，振兴中国乡村文化对于复兴中华文化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诚如范玉刚所言：“中华文化的一个鲜明底色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始终未曾中断的根脉更多地维系于乡村文化的肌理，因而乡村文化的复兴就使中华文化的筋骨充溢了活力，因而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引发的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中就自然牵系了中国乡村文化复兴的神经”，“乡村文化的复兴无疑是托举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乡土文明与作为其载体的乡村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更是今日中华文化创新创造创意的力量之源泉”。^④

^① 彭秋归：《乡村文化的自主性选择与在地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20日。

^② 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

^③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④ 范玉刚：《在中华文明与全球化双重视域中领悟乡村文化复兴的意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三、创新驱动乡村文化在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融合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但是，并非融合在一起就能自动地实现发展，尤其是对于当下多元复调的乡村文化而言，必须在“两个结合”的思想指引下，以创新驱动乡村文化在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① 如何才能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正确回答这一重大时代和实践问题，无疑也必须切实贯彻“两个结合”的思想精神。

乡村文化在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于推动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弃旧扬新的过程，每一个时代都给它从前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东西抹上一层“油彩”，正如新的“油彩”不能完全覆盖旧的涂层、颜色较深的昔日油彩往往会渗入新的涂层一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总是交融在一起。“今天，较之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无论是主动融入还是被动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一代农民，日渐生成并认同新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对传统‘乡土中国’的复归，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既要传承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又需要注入开放、契约、公平、创新等现代价值元素。”^② 乡村文化振兴亦非简单地返旧去复兴原来的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恢复往昔农耕文化或乡土文化的荣光，而是要传承、发扬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两个结合”的思想指引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乡村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载体功能，深入挖掘优秀传统乡村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既留得住乡愁又走向现代化，既具有乡土味又不失时代性。^③

乡村文化在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要采取以我为主的融合发展之策，积极主动地兼收并蓄其他文化的先进性元素和现代化因子。正如前文所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因此，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选择其中一个而抛弃另一个，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必须走出“悲观的文化虚无主义”或“激进的文化民族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跳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死板的思维模式和建设路径。乡村文化不应该成为城市文化的附庸，更不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4 页。

^②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

^③ 彭秋归：《乡村文化的自主性选择与在地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 年 2 月 20 日。

应该被城市文化所取代，而应在与城市文化的交流、对阵中实现个性化发展^①，将城市文化中的先进性元素和现代化因子积极吸纳进来，促进乡村文化的迭代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最终迈向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乡村文化这种以我为主的融合发展，除了要实现从“被动融合”向“主动融合”的根本性转变以外，还要发挥其赋能作用，激发其动力机制，将乡村文化切实转化为赋能乡村经济发展、驱动乡村社会进步、激发乡村内在活力、建设美好乡村生活的精神资源、活态资本和不竭动力。

乡村文化在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坚守乡村底色和创新驱动，以“农”元素为特色引领乡村文化在融合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农为魂、以文塑旅。盘活乡村丰厚的农耕、农业和农俗文化资源，引入文化创意元素，用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让乡村旅游成为难忘的精神之旅、文化之旅、体验之旅。坚持以旅彰文、以文兴农。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革命文化传下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开，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坚持农文旅相长。要找准三者相容性、契合处、联结点，形成兼具农业、文化和旅游特色的农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乡村农文旅融合，激发新动能、形成新优势。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是要因地制宜，避免同质化。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秉承“一镇一特色、一村一风韵”理念，弘扬乡村特色文化，以特色为引领，打造个性化、鲜明性的农文旅融合主题。依据村情民情，融合特色文化、产业、生态及美景，集聚优势，差异化发展民俗村、乡村乐园等项目，构建多元化、融合发展的农文旅新场景。二是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要求加强数智赋能，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引擎。随着数字乡村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来激活各种文旅要素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成为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加速器。

乡村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农文旅资源的优化整合，农文旅功能的提升以及农文旅产业的升级。通过在以上几个维度的机制创新，加快提升农文旅融合的协同发展水平，努力实现乡村农业、文化和旅游的互促互嵌和耦合创新发展。简言之，乡村文化要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融合，并走向二者的有机统一，从而通过创新驱动在融合中实现乡村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 梁 瀚)

^①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It embod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aith in Marxism and communism, their mission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ir commitment to a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ir practical character of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all of which collectively forge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such as its scientific nature, people-oriented charact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have endow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unique value markers.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it is essential to anchor ourselves in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preserving its political essence through rigorous clarification to ensure unwavering continuity; drawing cultural nourishment from learning,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to consolidate spiritual foundations; and innovating the means of transmission in step with the times to invigorate contemporary vitality.

Keyword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ultural gene; spiritual strength

Striving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u Licai(50)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ural culture has exhibited polyphonic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has always been in a process of integrated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about reviv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ulture, but about promoting its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a multi-cultural foundation, which is also an era-specific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has centered on industri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ural areas have long been in a dependent position, and rural culture has also fallen into a predicament of weakened subjectivity. Rejecting the Western one-size-fits-all development model,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corporates rural modernization into the core framework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clarifies that rural areas are an irreplaceable form of living and a carrier of civi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correction of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ith diverse cultures. Only by establish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can we achieve active and selective integr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ay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take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guide,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absorb advanced cultural element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ominence to ourselves, uphold the rural essence rooted in agriculture,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driven by innovation, strengthe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and take a path of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rural culture can become a core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nity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